

← (上接2版)

日本人经常自称历史上的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他们甚至称收藏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国家级珍宝（当然有大量佛教经典和汉籍）的正仓院为“海上丝路博物馆”。这些说法，都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亲近与认同，绝不局限于物质，这也是提议不要以“书籍之路”代替“海上丝路”的原因之一。

当然，谈到“海上丝路”精神文明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无疑就是汉籍东传日本。

## 五百年汉籍东传简史 以及几个重要问题

汉籍东传日本开始于公元五世纪之前。

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到九世纪末集东传汉籍之大成的、藤原佐世编撰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成书，历史大约五百年。

五百年汉籍东传史就是一部中华先进文明的传播史。

其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概述如下。

**五世纪之前**，日本文明尚处于草昧时代。传入汉籍的第一人，虽然不是王仁，但大概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归化人（“渡来人”）；“王仁献书”的说法具有象征性意义。

**七世纪之前**，日本文明迎

来曙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是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圣德太子颁布的《宪法十七条》。在日本政府派遣遣隋使之前，并没有大量汉籍进入日本，引进的也不成系统，但种类增加了不少。除了儒家经典《五经》外，涉及史、子、集部的一些主要著作，实用汉籍较多。主要还是途经百济，而非直接来自中国本土。

**七世纪、飞鸟时期**，掌握了权力和财富的中央朝廷以及皇族、贵族为了摆脱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始形态，开始不遗余力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物典章，其标志之一就是派遣使者赴唐，从此，真正打开了中日间直通的汉籍东传之路，汉籍主要来自中国本土。引进的汉籍不仅数量多了，而且呈现出了一定的系统性，主要的儒家经典及其注释书基本齐备，医药、历算方面几乎包含了当时流行的主要著作。

**八世纪、奈良时期**，政府、皇族、贵族沉浸在佛教文化、汉文化中，创造了灿烂的“天平文化”。其标志就是频频派遣遣唐使。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买求书籍”，遣唐使成了汉籍东传的主体。日本历史上集中地、大量地引进汉籍并构筑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汉籍库就在这个时期。其中，吉备真备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日本引进、收藏汉籍的奠基人；他的《将来目录》是一部记载日本汉籍东传的最早的完备的目录，可能是藤原佐世编

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主要根据之一。

**九世纪、平安前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三年后，宽平六年（894），宇多天皇听从了菅原道真的建议，中止了遣唐使，遣唐活动落下了帷幕。其原因是，日本律令制出现种种矛盾和破绽，政府不堪继续承受莫大的遣唐经费开支；唐、新罗、日本商船频繁来往日本，贵族们所追求的图书珍宝已经有商人输入，不必冒险渡海；唐朝已进入末期，凋敝衰落，在平安贵族的眼里，已经失却往日的“光辉”。中止遣唐，并非从此中止吸收中国文明，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日本中央朝廷为主体的自觉地、全方位地汲取唐代文明的历史告一段落。随着“国家队”退出历史舞台，“民间队”取而代之，汉籍库得以添砖加瓦，日臻完美。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汉籍开始东传日本的准确时期，史料阙如，存疑为宜。如果希望知道一个大致的说法，可以说滥觞于五世纪之前。

稍稍展开谈一点，介绍一些研究资料，感兴趣者可以查看。

为了探明文献东传的起始年代，中日学者作了不少努力，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徐福赉书”之说**。推断汉籍东传始于秦汉人移民集团或更早些，凭据是徐福的传说以及所谓超古代文书《宫下文书》。《宫下文书》是日本的“古

史四书”之一，也称《富士高天原朝史》。有有关论述详见吾乡清彦《日本超古代秘史资料》（新人物往来社，1976.11）、神原信一郎《富士宫下文書の研究—日本古代史》（日本シエル出版，1987）、铃木贞一《日本古代文書の謎》（大陸書房，1971）、佐治芳彦《謎の宮下文書》（徳間書店，1984）等。

**“新罗收书”之说**。以为汉籍东传始于公元四世纪中期，凭据是《日本书纪》卷一〇仲哀天皇九年（斯文会《日本汉学年表》列于公元四世纪中期）神功皇后征新罗“收图籍文书”的记载，详见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世界堂书店，1938.10）、谷川士清《日本书纪通证》（临川书店，1978.11）。

**“王仁献书”之说**。以为汉籍东传始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应神天皇在位年代，据斯文会《日本汉学年表》（大修馆书店，1977.7）]。静永健以为《日本书纪》卷一〇应神天皇十六年春二月条云：“是岁，百济阿花王薨。”阿花王，乃第十七代“阿莘王”，据《三国史记》，死于公元四〇五年九月。其根据就是上引的《日本书纪》、《古事记》的记载。《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9）。

“徐福赉书”、“新罗收书”二说，所据原始文献皆非信史，对文献的解读更是见仁见智。徐福“入海”本属传说，至五代后周显德初开元寺义楚《释氏六帖》方衍化为“渡日”。至于《日本书纪》仲哀天皇九年所谓“图籍文书”的含义，语焉不详，学界众说纷纭。唯“王仁献书”之说，兼具年代、人名和书名，故列举于上。《古事记》成书于元明天皇和铜五年（712），所据乃所谓“帝纪”、“旧辞”等（原始资料群），“王仁献书”这段记录是其中之一，“千字文”等书名，小岛宪之怀疑是六世纪末人添加进去的。所以，汉籍东传的源头，也许跟追溯日本民族的起源一样，是一个旷古之迷。

二、至少至七世纪初为止、派遣遣隋使之前，日本并没有大量的汉籍。有的学者以为当时已经有“大量书籍”进入日本，不符合史实。

三、七世纪之前，汉籍主要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630）派遣遣唐使起，汉籍开始多直接来自中国本土。

四、遣唐使是汉籍东传的主体，遣使的重要目的就是“买求书籍”。其中，吉备真备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日本引进、收藏汉籍的奠基人；他的《将来目录》是一部记载日本汉

籍东传的最早的目录，很可能是藤原佐世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主要根据之一。

五、日本历史上集中地、大量地引进汉籍，构筑起规模宏大的汉籍库，可能是在八世纪奈良时期；学界至今以为奈良、平安时期大量引进汉籍的观点，大致不错，但嫌笼统。

六、学界至今津津乐道的入唐僧在汉籍东传中的作用，有夸大之嫌，应该修正。

七、引进的汉籍在确立日本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以及汉文化的兴盛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 中华文明的累累硕果

五百年的文献积累、规模宏大的汉籍库，就成了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部日本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的成书基础。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一部记录了日本国平安前期为止传世的汉籍的总目录，著录了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汉籍，相当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的二分之一。据我考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失收汉籍，尚有约二百余部（除佛教、道教经典）。所以，到日本的平安前期为止，中国八世纪以前一半的汉籍已经东传到了日本。这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汉籍是一个传播文明的载体。中国先进的精神文明借助这个载体传到了日本，使得日本摆脱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始形态。以天皇为首的日本贵族以及知识人以中国（唐朝）的制度、文化为楷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政治制度基

(下转4版) →



西安碑林边的环城公园是唐代国子监遗址，内有日本入唐的伟大留学生吉备真备的纪念碑



楼正豪摄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